

环保如何成为全球性议题

从《寂静的春天》拉开现代环保运动的大幕，到“世界八大公害事件”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警醒；从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引发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到《巴黎协定》将气候变化问题列入全球议程，同年10月规定每年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人类对环境的关注越来越深刻也愈加广泛。环境问题早已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50年后的今天，环境问题依然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但让人欣慰的是，可持续发展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这让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更加乐观。毕竟，如果说造成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是人类错误的思维，那么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人类的理念。

1962年6月16日，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开始在《纽约客》杂志连载。尽管当时卡逊在美国已经颇有名气，《寂静的春天》引发的反响之热烈，还是让很多人始料未及。

卡逊在书中将矛头对准了一种叫DDT的农业杀虫剂，称它不仅杀死了害虫，也污染了大自然的食物链，甚至让人类染上癌症，并危及子孙后代的健康。

彼时，DDT在全美广泛使用，被美国农业部门寄予厚望，认为它将有效控制虫害和杂草，实现粮食大幅增产。特别是在冷战背景下，依靠DDT这样的“神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一度被西方国家奉为圭臬。

表勇

这样的景象引发了一些人的担忧。美国一位鸟类保护区管理员给卡逊写了一封信，告诉她DDT造成保护区内鸟类濒临灭绝，希望她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调查，改变DDT滥用现象。这促使此前就一直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卡逊开启了《寂静的春天》的写作。

《寂静的春天》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环境科学著作，其内容带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卡逊的文笔极具张力。例如，她将DDT称作“死神的特效药”。

作品一经发表，立刻轰动了整个美国，引发了全民讨论。《寂静的春天》也被认为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它第一次让环境问题成为全民讨论的对象，环境意识和环保运动成为一种全社会性现象。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国会讨论这本书，并成立了咨询委员会调查书中谈及的问题。它产生的社会效应还促使美国成立单独的环保机构，并开始针对环保问题大量立法。10年以后，先是美国进而是其他国家，也开始逐步禁用DDT。

然而，因为《寂静的春天》中的内容及语言风格剑走偏锋，并对农业化工企业等利益相关方造成巨大冲击，招致了猛烈的抨击。该书的出版编辑说，《寂静的春天》是继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遭遇攻击最多的著作。有化工企业高管声称：“如果人人都听从卡逊小姐的教导，我们就会回到中世纪。”科学界也有人对该书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毫无严谨性可言。例如，卡逊在书中几乎断言DDT是一种致癌物，但科学研究却一直没有找到DDT直接致癌的有力证据。

虽然《寂静的春天》充满争议，但是20世纪以来，环境污染导致的现实残酷性丝毫不逊于书中所述。尤其是二战结束后，许多国家都忙于战后的社会经济重建，加之工业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冷战带来的狂热竞争，经济增长被置于至高位置，环

境污染和破坏也随之而来，人类也开始承受代价。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最使人痛心的包括：发生于1930年12月的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致60余人死亡，数千人患病；发生于1948年10月的美国多诺拉镇烟雾事件，致17人死亡，5910人患病；发生于1952年12月的英国伦敦烟雾事件，短短5天时间导致4000多人死亡，事故后的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因此病故；二战后连续多年爆发的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烟雾致人五官发病、头疼、胸闷，汽车、飞机安全运行受威胁，交通事故增加；1952年至1972年间发生在日本的水俣病事件，致50余人死亡，283人严重受害而致残；1931年至1972年间发生的日本富山骨痛病事件，致34人死亡；1961年至1970年间在日本四日市发生的哮喘病事件，受害人超2000人，死亡和因不堪病痛折磨而自杀者数十人；发生于1968年3月至8月的日本米糠油事件，致5000余人患病，16人死亡，另有数十万禽畜死亡。这些问题集中爆发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这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统称“世界八大公害事件”。

然而，尽管环境污染已经如此严重，但那个年代的大部分国家依旧没有足够重视，其中又以日本尤为典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进入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工业飞速发展，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环境保护及治理措施，致使工业污染和各种公害病泛滥成灾。

1956年，日本水俣湾地区最早发现水俣病病例，轻度患者口齿不清、面部呆滞、步履蹒跚，重者极度亢奋，身体慢慢变成“弓”字形，并很快死亡。最终确认病因是由于当地氮肥厂将大量含汞废水直接排入水俣湾，污染了鱼虾，进而导致当地人食物中毒。然而，日本政府对此却毫无作为，以至于该公司肆无忌惮地继续排污12年，直到1968年。

《寂静的春天》的面世和日本发生的一系列悲剧，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警醒，随之展开了大规模的环保社会运动。1970年，美国开展了旨在保护环境的“地球日”活动，喊出了“不许东京悲剧重演”的口号。全美有2000万人参加了第一届地球日集会。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总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进一步推动了环保问题在全球的关注度。罗马俱乐部成

立于1968年4月，其宗旨是阐明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相关建议，以引起政策制定者和舆论的关注。罗马俱乐部成立后，提出了“人类困境”的概念，并力图为一系列世界性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研究成果，是1972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报告通过科学建模方法，引入世界人口、粮食、资源、污染和工业产出等多种变量，模拟出1972年至2100年可能出现的13种“未来场景”，并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类生态足迹的影响因子已然过大，生态系统反馈循环已经滞后，其自我修复能力受到严重破坏。如果按照当时世界人口、工业化、粮食生产、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增长趋势，地球将在100年内达到承载极限，并导致人类发展出现突然和不可控制的衰退。同时，报告还认为，这样的悲剧并非不可避免，只要人类摒弃不惜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思维，及时改变发展模式，就能够实现更均衡的发展状态。

和《寂静的春天》一样，《增长的极限》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但是比《寂静的春天》更进一步，《增长的极限》把议题扩大到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层面。人们开始意识到，社会发展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解释权也不仅仅掌握在经济学家和金融人士手里。

在一次又一次社会舆论的推动下，联合国和世界各国政府再也坐不住了。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讨论当代环境问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环境问题被首次列入全球议程。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后代而共同努力。

1972年10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建议，规定每年6月5日为“世界环境

日”，要求联合国机构和世界各国政府、团体在每年6月5日前后举行保护环境、反对公害的各类活动，来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性。12月，联合国大会作出建立环境规划署的决议，其主要任务是监测环境状况，为决策提供科学信息，并协调各国应对世界环境问题。自此，人类开始在机制层面寻求环保国际合作。

50多年后的今天，环境问题依然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我们仍可时常看到人类竭泽而渔的冲动。但让人欣慰的是，与这种短视思维斗争的人越来越多，可持续发展理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这让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更加乐观。毕竟，如果说造成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是人类错误的思维，那么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人类的理念。

正如《增长的极限》作者德内拉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所说：“如果我们相信无法改变破坏，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太弱小无助而无能为力，那么一切就真的结束了。”

是的！人类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信心并付诸行动，不能让保护地球的努力“真的结束”。

摆错位置的“美餐”

林家豪

食品浪费问题是一个严峻而严肃的世界性问题，在特别注重美食的法国也不例外。

根据法国能源环境署的报告，在法国，每年约有1000万吨食物白白浪费，相当于1000个埃菲尔铁塔那么重。另有权威机构统计，32%的食物浪费发生在生产环节，21%在加工环节，14%出现在存储和运输环节。让人意外的是，销售和消费环节的食物浪费占比不及产业链上游，为33%，其中商家和家庭占比分别为14%和19%。浪费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于有人直白地控诉：“浪费发生在食品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

一项冷门的研究关注了100个土豆从田间到餐桌的“旅程”。其中，会有两个土豆在收获时被遗忘在田里；9个在分类时被丢弃；20个在存储和运输时丢失或损坏；加工会导致相当于20个土豆的损耗。上市后的情况同样糟糕，9个土豆因为品相不佳被商家或消费者扔掉。加上其他不可控因素，最终历经层层考验成功“抵达”餐盘的土豆仅有25个。

为什么如此多的食物在上餐桌前就被浪费？

导致生产环节中食物浪费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食品分级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营养丰富且外形美观的食物更得法国人青睐。生产者为了追求更理想的销路和更理想

的价格，对食品品质严格把控，衍生出一整套食品分类评价体系，涵盖食物的尺寸、外观、颜色等外在要素。果蔬成熟后，生产者会参照此标准细致分类，个大饱满的“搭上快车”优先上市，品相不佳的则很可能被留在地里任其腐烂。水果种植产业深受其害，果肉娇嫩如桃、杏、李子等，更易出现瑕疵而无法销售。其实，这些“歪瓜裂枣”只是颜值欠佳，品质无虞，大可用于深加工领域。但很多时候，生产者与下游加工部门对接无门，再考虑到运输成本，便一扔了之。

加工过程也是造成浪费的“大户”。在制作鲜榨果蔬汁时，加工者会为了去除生涩味给果肉去皮。以胡萝卜为例，在配料比例合理的情况下，胡萝卜皮并不影响果汁口感。有资料显示，一家法国公司只是省去给胡萝卜去皮一个步骤，每年就减少了154吨食物浪费，相当于节约了33000欧元。另据统计，土豆是加工过程中浪费最多的食品之一。人们喜爱以土豆为原料的炸薯条，但薯条必须切成大小均匀的条状，这样看起来才有食欲，剩下的边角料则无人问津。此外，许多沙丁鱼制造商在装罐前会去除鱼头，一些农场主在宰杀动物后还会将内脏丢弃。

食品存储和运输过程中的浪费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家对产品销量的预测。如今越发多元化的购物渠道和选择使商家很难精准预测到自己要准备多少存货。当商家购入新鲜农产品时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如果供大于求，就会导致浪费，减少利润；如果供应不足甚至出

现断供，客户则可能转而寻找其他品牌的同类产品，这更是商家不愿承担的风险。为保持客户忠诚度，许多商家宁可采购和囤积过量食物以备不虞，哪怕明知它们很可能会待在仓库里慢慢变质。

在法国，根据法律规定，食品生产商应在果蔬等新鲜食品外包装上标注最佳食用期限和保质期。通常情况下，如果外包装无破损，即便食品已经超过最佳使用期限一两天，仍在保质期内，完全可以放心食用。但最佳食用期限的设置给了消费者一种错觉，不少人将其与保质期混淆，对“超期食品”一律说不。据欧盟委员会统计，20%的食物浪费与民众不了解食品食用期限有关。

真是让人惋惜！很多被丢弃的食物完全可以通过合理利用变成美食。好在法国政府已认识到问题的严峻性，决定采取实际行动解决食物浪费问题。

2016年2月，法国政府出台《反食物浪费法》，规定商家必须将未售出但仍可食用的产品捐给慈善机构，私自销毁将会面临处罚。商家和慈善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后，能获得捐赠食物价值60%的税收减免。这一法案招致一些批评声音。反对者认为：其一，法案缺乏配套的监管措施，变成了措辞强硬、手段乏力的“空中楼阁”，制裁效力有待考量。其二，法案中存在漏洞，给不法商家留下了“钻空子”的余地。个别商家有可能向慈善组织输送无法食用的食品，以赢得税收减免，而获赠方也有可能没有时间和精力对食物进行细致分辨。同时，法律并未对捐赠最

低数量和频率提出要求，这意味着，捐赠多少食物的决定权在商家手里。其三，法案未能规范生产环节的浪费现象。有观点认为，反浪费的法律法规应优先考虑生产过剩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食品供应链上游的大规模浪费现象才更重要。

应该说，该法案虽未能形成普遍共识，也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浪费现象，但仍促成了一些进步。

19世纪法国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的名画《拾穗者》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秋天金黄的田野上，3位农妇斜向排开，在收割后的田地里弯腰拾捡遗留在地上的麦穗。“拾穗”是旧时法国劳动人民获取食物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收获季节，好心的麦田主人会允许妇女儿童到田野里拾取麦穗充饥。最近几年，“拾穗者”又出现在法国的大街小巷。往常，这些为生活所迫的穷苦人常常需要为了一顿晚餐在垃圾桶之间奔波。据有关统计，依照不同的“贫困”定义，法国“穷人”数量在500万至880万之间，需要获得包括餐饮在内的各种生活救济。现如今，法案促进了商家与慈善机构的合作，这些机构能够获得相当数量且质量不错的临期食品。他们在法国各地活动，将食品处理后免费分发给穷人。以爱心餐厅为例，借着法案出台的东风，这家机构年复一年地为各地的贫困人士免费送餐，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每年为近百万人分发上亿份免费餐饭。此外，法国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食品回收初创企业。他们不仅致力于消除商家与受赠者之间的壁垒，还不断优化物流资源，帮助收集、重新分配和再加工食物。

更重要的是，法案正帮助法国人提高反浪费意识，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开始形成“光盘”意识，在日常采购过程中也越来越节制。大量法国人从自身做起，包括将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回家，这也为下一步的改变奠定了基础。

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绿松石湖。
(视觉中国)

